

曾康霖著作集

(八)

银行论



中国经济出版社

www.economyph.com

曾康霖著作集

(八)

银行论

中国经济出版社



摄于 2004 年夏

增进两岸学术交流



在第一屆兩岸金融學術研討會上發言



受到台灣同行的熱烈歡迎

《曾康霖著作集》自序

年事的增加,常常会唤起对过去的回忆。屈指算来,从1960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时起,我在金融教学和研究的职业生涯中,不知不觉已度过了40多个春秋。坐在书斋,看着四壁累年渐增的书典,回溯走过的日子,颇有些感慨。人之生存于一世,各有活法,各得其乐,如同学问之道,同工异曲,方得其妙。当然,结果则可能是有喜有悲,有收获,也有遗憾。然而,在流逝的时间面前,都不重要了。

回顾40余年的职业生涯,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中,前近20年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少有思考和研究,大部分时间过着两耳但闻运动声,无心苦读圣贤书的生活,真正的学习和研究应该说是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指引下,我国的知识界迎来了得之不易的学术春天,我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道,也幸运地在这欣欣向荣的春天里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去日不可留,来者犹可追。感受到光明流逝的催迫,在这以后的20多年中,我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术研究、学科发展和学生培养上。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不仅要恪尽职守,而且要不断进行知识更新,提高业务水平。知识的形成和积累,是一个汇涓流以成江

海的过程,需要厚积薄发、与时俱进。我深信,能否做好学问不全在于天资聪颖,关键的是要具有善于发现、勤于思索和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学术智慧来源于厚重的实践和独立的思考。在不断延展和深入的思想之旅中,我逐步地在更新知识与观念。站在一个经济学人的角度,时刻观察和思考着这20多年来经济金融改革和建设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让它们在课堂上和刊物上接受检验。

在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中,我逐步形成了这样的学术思想:既尊重经典,又不迷信经典;既注重书本,更注重实际。这套《著作集》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的这一学术态度。在我的理念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但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运动和发展,哪怕是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也概莫能外。理论总是依据一定的实际进行抽象而得出结论,但任何实际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存在于一定时空和条件之中的。如果特定的时空和条件变化了,依据的事实不存在了,或者把抽象掉的因素再考虑进去,则又当得出不同的结论。我这个人,思想不僵化,不故步自封,乐意接受新生事物。在改革开放形势的促动下,我较早主动地、有选择地接触和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概念。西方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搞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理论、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指导。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是市场经济学,我们少不得要批判地学习和借鉴。此外,我经常向学生强调

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注重从实际升华到理论。实际是生发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土壤,我国特定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事业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宝藏,特有的经济转型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研究模本,我有许多文章的灵感就直接来源于基层部门的实践。

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著作集》是在学习前人的知识、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密切地结合中国实际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著作集》由专著和论文构成:(一)集至(八)集和(十二)集为专著,(九)集至(十一)集为论文。其中,《货币论》、《货币流通论》、《资金论》、《信用论》、《利息论》、《银行论》,是我主编的《金融理论系列专著》的组成部分。其共同特点大都是以学说史评介为起点,不仅系统地评介了国外学说,而且评介了国内学说,以此领略前人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并继承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密切联系实际,对该领域中存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做出探讨。在有的著作中,我的亲人和学生参加部分章节的撰写,这些部分严格说来不是我的著述,但为了保持专著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也放在一起,方便读者阅读。论文集中编入的是这些年来联系国内外实际进行探讨的学术论文,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这些论文在当时的条件下或许具有价值和解释力,而今时过境迁,其中部分论文的价值也许已经减弱或甚至丧失,但我仍然把它们保留在这套《著作集》。作为金融实际与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事实,同时也以此表明学习研究和认识的历程。

近20年来,金融实践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金融理论研究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甚至“金融”这个概念都需要重新推敲了。基于这种实际,按传统的模式来研究金融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就金融研究金融也有局限性,为此,我调整了研究的视角:从单纯地研究金融转向着力研究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并致力于边缘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研究。在这套集子中,我特别要向读者推荐《金融经济学》和《研究视角论》。“金融经济学”在国内外有几种模式,但把金融与经济的基本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探讨它们的运行机理,特别是把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产业进行考察,在国内还不多见,这种理论体系可谓有创新之处。《研究视角论》主要表明:当代对金融的研究要拓宽领域,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思考的过程中,我深感越往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前行,就越发现自身的渺小和真理的无限。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愿意把大部分的思考成果奉献给读者,读者的认同当然是对我最大的奖励,即使是批判,我也为做了金融理论建设上的一块引玉之砖而感到欣慰。文章总为心声,功过留待评说。

《著作集》出版之际,我要衷心感谢我的老师、学生、同事、朋友和亲人,以及我多年来的读者,正是在他们的关心、支持、帮助和爱戴下走到了今天。这份深情,是我最可宝贵的人生财富,值得我倍加珍惜和不断回味。

曾康霖

2003年5月于成都光华园

此著作 2002 年荣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经济学二等奖

银 行 论



《金融理论系列专著》总序

这些年来,我国高等财经专业教育有长足的进展,但是必须看到在教学中有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1981年8月我写了一篇《金融理论教学的内容需要更新和丰富》的文章(载《金融研究》1981年第8期),提出了造成这种状况主要的原因是:(1)受苏联教材的束缚;(2)受传统观念的影响;(3)受“左”的思想和错误的干扰;(4)出于对权威的迷信;(5)囿于革命导师的个别论述;(6)出于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并指出:高校教学不能是单纯地传授知识,还应当为更新和发展这门学科做出贡献。

怎样来改变这种状况和实现这一目标:科研为教学服务。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与专业科研部门的科研的共同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发展和繁荣祖国的科学和文化做出贡献。但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造就人才,因而科研要有助于培养和造就人才,科研应为教学服务。金融理论系列专著,就是在这种思想促使下,逐步形成的。

说它是逐步形成,是因为起初对能不能写成专著,特别是系列专著,还没有把握,还缺乏信心。这些年,边教学、边学习、边研究。使我有机会更多地接触金融学科领域中前人丰硕的研究成果、今人结合实际的探索,可以说这一系列的写作是在前人启迪和当代人的推动下形成的。1984年前后,我写的《金融理论问题探索》和《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终于先后出版问世。但它们有的是对历史的回顾,有的是对现实问题的探索,跨越的时间长,涉及面广,可以说那是总体“概览”和粗略尝试。而把金融理论一方面一方面的课题“梳成辫子”进行研究是以后的事。1987年,出版了我写的《货币流通论》,在那本书中虽然以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我国的现实,集中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简单商品流通的货币流通、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流通以及信用制度下的货币流通,

但它的缺陷是没有评介货币流通学说史,因而谈不上“承前启后”。从学说史开始对金融学科的资金、信用、利息等问题进行研究,是在这本书以后。90年代初中国金融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与他人合写的《资金论》、《信用论》、《利息论》,这几本书的共同点都是从学说史评介起,不仅系统地评介了国外学说,而且评介了国内学说,以此领略前人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并继承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的侧重点仍然是现实。在这几本书中学说史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大量的笔触是论述现实问题,是人们关心的金融热点。因此,我们称它们为一种“论”,而不是一种“学”。论者应畅所欲言,可“天南地北”,可“海阔天空”,但在这里必须扣紧主题,向纵深发展,不能不着边际。所论之处虽然不能都称之为学说,却是以学说为指导,“论中有学”。

90年代以来,我系青年教师的理论素养进一步提高。理论研究逐步壮大,形成梯队,为了培养和锻炼年轻的一代,我把这套系列专著的写作任务交给了青年人,自己只在写作体系、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上当参谋。青年人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他们有很多优势,因而《货币论》、《银行论》、《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论》、《证券论》、《发展金融论》等都将是他们的创作。应当承认要完成这一系列著作是不容易的,他们不仅要阅读大量中外名著,研究历史,而且要熟悉现实,研究现状,探讨人们关心的问题。而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模式又正在形成、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在发展成长的经济中去论述金融问题,也只能是发展成长的。从这个意义说,它们还不一定成熟,还需要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培养浇灌。

西南财经大学

曾康霖

1992年春

前 言

银行这个词始于意大利语 banco,原意为长凳,英语移植为 bank,原意为存放钱的柜子。在中国,把这个词翻译为银行,也许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货币制度以银作为本位,流通中主币为银币有关,也许与把经商的店铺称为行有关。据《景定健康志》记载,公元 1057 年福州知府蔡襄作教民十六事,其中第六条为“银行辄造吹银出卖许人告捉”,也许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最早使用“银行”一词的出处和时间。但那时的银行不是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银行,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银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当代,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银行业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银行业为枢纽的金融业渗透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曾经把银行制度称做“精巧”的产物,列宁把银行称做“绝妙”的机关。当代,其“精巧”的组织与管理更引人注目,其“绝妙”的运作与功能更值得探索。

讨论银行的“精巧”的组织与管理 and “绝妙”的运作与功能,散见于教科书和大量的金融著述中,并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现推出的《银行论》是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系统地探索各类银行的功能和奥秘,在写作上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生成原因的研究,求得历史与逻辑的协调统一

在教科书中,对银行的产生,多概括为与高利贷斗争的产物,“金匠”的转化。其实,银行的产生比“金匠”早得多,银行业的前身主要是商人特别是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这样的商人之所以要组织银行,自然有它的背景和目的,但,银行业的产生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的行为,是社会各种因素促成的结果。《银行

论》论述了银行业产生的经济基础、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在这样一般地论述的基础上,探讨了各类银行生成的历史条件和特殊原因,力争求得历史与逻辑的协调统一

(二)注重制度背景的研究,求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统一

事物的发生发展总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剖析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而说明事物的发生发展,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常用的研究方法。银行这一事物的发生发展也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因而也部分借鉴了制度经济学研究问题的方法。在《银行论》中,不仅剖析了西方银行业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而且剖析了中国银行业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指出:中国银行业产生和发展的经济背景主要是官办经济;中国银行业产生和发展的政治背景主要是财政需要;中国银行业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是“洋为中用”。史实告诉人们制度因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在《银行论》中,着力论述了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四个阶段的政治、经济背景;着力结合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背景对投资银行业与商业银行业的分野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从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上加强了对投资银行业的管制。

对政策性银行在本世纪30年代后的普遍建立,也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引发的大危机背景出发进行了研究。对国际政策性银行的建立更是一开始就结合二战后国际货币体制动荡、混乱的背景和英美两国企图建立自己的金融霸权而展开明争暗斗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战后国际政策性银行既是改变国际金融混乱局面、建立统一国际货币制度的要求,也是英美两国矛盾斗争的产物这一结论。

(三)注重比较研究,求得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协调统一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发展。在《银行论》中,作者注重比较研究:论述了中国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与国外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论述了不同国家投资银行的不同特征;论述了投资银行、政策性银行、合作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共性与特殊性。不仅如此,这种比较研究还深入到银行内部经营管理,如分业经营模式与混业经营模式的比较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银行论》探讨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即法国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为什么滞后英国近 100 年,对此作者着力对法国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滞后英国近 100 年的经济、政治、思想因素进行比较,并得出初步的结论是:其经济因素主要是高利贷盛行;其政治因素主要是资产阶级贵族化;其思想因素主要是约翰·劳银行改革的失败,银行失去了社会公众的信任以及法国人对外来新生事物的畏惧、因循守旧。这两个国家银行业发生发展的比较分析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即经济发展与银行业发展是什么关系?是否经济发展了,银行业就一定发展?银行业滞后发展,为什么经济又能超前发展?

(四)注重相关关系研究,求得相互关系的协调统一

事物总是生活在相互关系之中,银行业也不例外。《银行论》着力研究了:早期商业银行与贸易的关系;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关系;以及各类银行自身资产与负债关系等。通过这样的研究,不仅要揭示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一面,而且要从对它们的各种关系的分析中求得新的理性认识。如银行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就很值得研究,其“投入”与工商企业不一样,投入的不是原材料,而是社会对它供给货币的需求。其“产出”是创造金融商品,提供金融服务。这表明,银行的“投入”具有被动性,银行的“产出”具有适应性。

(五)注重传导机制的研究,求得各种变量、因果关系、目标与

运作的协调统一

从动态的角度观察银行业的运作,要研究各种变量、因素的传导机制。这种传导机制集中体现在各种业务中。《银行论》着力论述了各类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的传导机制,这种机制集中到一点,即是“以承担负债去占有资产”,还是“以让渡资产去减少负债”。不仅如此,《银行论》在着力对跨国银行两大典型业务,即国际贷款与外汇业务作详尽评价的同时,探讨了跨国银行活动与欧洲货币市场的传导机制。这种机制表明,跨国银行的业务活动置身于欧洲货币市场,欧洲货币市场依赖跨国银行的业务活动而发展,而兴衰。

(六)注重变化发展的研究,求得现状与未来的协调统一

《银行论》不仅对银行业的现状进行了评价,而且着力探讨银行业的变化、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在中央银行一章中,考察了宏观金融调控中介目标、手段的变化;在政策性银行一章中,考察了本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政策性银行业务的变化;在跨国银行一章中,考察了当代跨国银行组织机构、运作方式以及投资形式的变化。通过对变化发展趋势的分析,初步得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结论,如央行调控的日益市场化、政策性银行日趋商业化,并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商业银行向何处去,商业银行是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还是追求范围经济效益;是主要从事“批发业务”,还是主要从事“零售业务”;是主要立足于全球战略,还是主要立足于区域战略等。

(七)注重中国现状的研究,求得与国际惯例的协调统一

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银行业的建立、发展、运作、管理等,必须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必须向国际惯例靠拢,但借鉴国外的经验需要选择,向国际惯例靠拢有一个过程,而且只能从中国的现状起步。为此,《银行论》在每一章中,都专节评述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现状,与国际惯例的差距,能够借鉴什么,不

能借鉴什么。

在政策性银行一章中,借鉴国外做法,结合中国国情,针对能否把政策性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中国政策性银行与政府关系模式的选择、政策性银行能否办理一般存贷款业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合作银行一章借鉴西方国家合作银行演变的规律,对中国农村合作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研究,提出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将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以县联社为基础改组为地方性农村合作商业银行,将落后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办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的设想。在储蓄银行一章,借鉴国外做法,结合中国国情,论述了中国建立和发展住房储蓄银行的必要性,并对中国住房储蓄银行的模式进行了研究。在投资银行一章,对中国要不要重新组建投资银行、中国投资银行经营模式选择、中国投资银行业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跨国银行一章中,对中国银行业走出国门进行了详尽分析,肯定了已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差距,探讨了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通过这些方面的分析,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寻找出精神支柱和政策措施。

《银行论》的写作,从构思体系、草拟写作提纲、收集资料、落实写作人选,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的时间中,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图书馆、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的热情支持。西南财经大学的冯肇伯教授、袁远福教授和缪明扬副教授对书稿的部分章节进行了指点,研究生仲崇岗和吴庆同志为书稿做了许多打印、校对工作,我们对他们的深情厚意表示衷心的感谢。

《银行论》第一、二、三、十章由曾康霖撰写,第四、五、六、七、八章由谢太峰撰写,第九章由王敬撰写,最后由曾康霖总纂、审定。这本书能及时出版,全在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支持,特别是谢乐如教授的关心,为此,我们对他们的关心支持一并表示谢意。

作者

丁丑年春